

·探索与争鸣·

运动项目文化研究

编者按：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体育强国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重要部署，推动我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体育学刊》编辑部推出“运动项目文化研究”名家笔谈专题，聚焦“运动项目文化观”，以体育运动项目为窗口，回溯历史源流、提炼精神内核、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擘画发展蓝图，既是对体育文化育人功能的深刻践行，更是为中国体育注入精神力量的创新之举。笔谈旨在通过多学科、多视角深度对话，呈现“三大球、三小球”以及武术、游泳、体操等运动项目的文化脉络、精神内核及学术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成果，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同时，期待借此次笔谈的机会，接下来汇聚更多学者开展运动项目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6)01-0001-22

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项目文化的价值回归与体系重构

卢元镇，马廉祯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1 技术喧嚣下需要重新锚定运动项目的文化原点

中国体育在经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21年东京奥运会，并经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洗礼，正逐步超越单纯追求金牌数量的阶段，进入深度调整的历史转型期。与此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浪潮正深刻影响着体育领域，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算法训练正在重构体育的形态。在这种技术高度介入的大背景下，体育存在着被异化为单纯精密科学的风险，而其人文属性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挑战。此刻，学术界探讨运动项目文化观，其深层意涵不在于标榜范式革命，而在于理清思路，校准认知偏差并确立更为稳健的价值坐标。

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梳理工作。人们需要厘清运动项目究竟是单纯的生物力学过程，抑或是人类特定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如果这个原点问题不解决，任由技术理性无限扩张，存在体育可能沦为缺乏人文意蕴的机械运动的风险。

长期以来，在赶超型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中，运动项目常被简化为竞赛规则的集合体。这种工具理性的视角虽然高效，却造成了项目认知的窄化与价值判断的偏狭。人们过度关注如何使球飞得更快，却忽略了球类运动所承载的社区情感；人们研究如何让武术动作更难、

分值更高，却淡忘了武术背后蕴含的传统哲学关怀。

因此，构建运动项目文化观，不是要否定科技的进步，而是要确保知识发展方向的准确性。必须将运动项目从冷冰的数据中回归为有温度的文化生命体，确立其作为现代社会治理微观实验室与国民情感公共空间的地位。

2 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的本土化困境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的滋养

在探讨具体项目时，必须超越简单的技术分析框架，运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综合视角，深刻剖析西方现代竞技项目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现代竞技运动，尤其是以篮球排为典型的三大球，其本质是西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法治精神的产物。它们进入中国的过程，不仅是体育技术体系的移植，更体现为异质文化在制度框架、群体心理与伦理价值层面的剧烈碰撞。因此，对于三大球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不应局限于体能或管理的表层归因，而应看到其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排异与管理错位。

首先，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导致了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割裂。从历史维度看，近代中国引入西方体育的初衷是“保国强种”，这使得体育肇始就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种逻辑下，运动项目被视为获取金牌、振奋民族精神的工具，而其作为游戏本质属性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则被长期遮蔽。这种重工具、轻价值的思维定势，致使实践层面出现严重异化。为追求成绩，可以把运动员封闭起来像机器一样训练，却忽略了他们作为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当运动员在封闭系统中与社会隔绝，他们很难理解职业体育所需要的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为何许多

项目一旦市场化就乱象频出的根源。

其次,现代赛场的契约精神与本土熟人社会逻辑存在深层冲突。现代集体球类项目的基石是契约精神,规则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深植于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模式,其特征表现为“差序格局”与“熟人伦理”。这种文化惯性投射到赛场上,则表现为对规则的变通与对裁判权威的消解。在职业联赛中,之所以频发默契球、人情哨,其根本症结在于普遍缺乏对规则本身的信仰,惯于运用人情关系网络去消解制度的刚性约束。当规则变得可塑,战术纪律和公平竞争就成了无本之木。

再次,沿袭工业化的机械团结与适应高水平竞技的有机团结发生了组织错位。现代足球和篮球要求场上队员在高度专业分工的基础上,瞬间做出独立决策并与队友达成默契,这是典型的有机团结。这需要运动员具备极高的自主性与创造力。然而,长期“三从一大”的集训模式,往往沿袭的是工业化初期的机械团结逻辑,强调统一指令下的绝对服从与标准化执行。这种管理方式或许适合强调动作重复精度的技能主导类项目如举重和跳水,但应用在瞬息万变、需要高度战术博弈的集体球类项目上,常使得队伍在关键时刻缺乏应变能力,难以应对复杂的赛场局势。

最后,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人为切断了职业体育的社区根脉。世界成熟的三大球文化无不深植于市民社会与社区共同体之中。俱乐部作为城市文化图腾,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记忆。在我国,长期的体工队模式在物理空间上切断了球队与社区的血脉联系,后来不成熟的职业化改革又沦为企业的广告载体。俱乐部名称频繁变更、主场场馆随意搬迁,都致使体育很难沉淀为稳定的在地文化。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中国体育的内生动力也正在基层悄然重构。以贵州“村BA”“村超”及江苏“苏超”为代表的基层赛事的现象级爆发,恰恰提供最具说服力的鲜活实证。这些赛事之所以能在大众层面获得空前的成功,正是在于跳出了体育的行政桎梏,回归了社区本位。它们没有华丽的场馆与昂贵的外援,却拥有最纯粹的乡土情感与宗族邻里纽带。这一鲜活的实践证明,一旦体育挣脱过度行政化与功利化的束缚,真正扎根于民众的生活世界,便能迸发出惊人的自我造血能力与文化生命力。这种结构性反差,也昭示了未来中国三大球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将体育还给社区,还给生活。

3 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需建立专家主导的治理机制

在构建中国自主体育知识体系的宏大叙事中,以

武术、健身气功、舞龙舞狮及各类民俗运动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传统项目绝非陈旧的历史遗存,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在漫长历史中积淀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独特成果,其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观与“身心一元”健康观,构成区别于西方对抗性体育体系的重要价值维度。

客观地看,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了配合国家体育外交与塑造国家形象,中国曾对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项目进行标准化的竞技改造。这种以“高、难、美、新”为导向的改革,在当时适应了亚运会等国际竞技舞台的需求,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过度追求视觉冲击与难度指标的竞技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发项目文化的蜕变。当武术变成仅供观看的惊险体操,当舞龙舞狮变成了纯粹的杂技表演,它们便逐渐剥离了原本承载的攻防含义、养生功能与宗族礼仪,使其从鲜活的生活方式,异化为悬浮的景观展示。

在新时代,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亟需建立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杜绝轻率的行政干预与过度删改。无论是武术流派的代际传承,还是健身气功的功法演变,抑或龙舟竞渡的仪式规程,其内部均蕴含着深刻的生物力学原理、传统医学逻辑与社会文化意义。既往为比赛转播方便,迎合西方审美标准,而随意删减套路、修改规则的做法,应当得到反思与纠正。每一项改革都应是对传统的有效传承与现代阐释,而非简单的“削足适履”。以健身气功的推广为例,不能仅停留在动作规范的统一上,更应深入挖掘其调理脏腑、安顿心灵的内在机理,使其真正服务于“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还需警惕过度商业化与泛娱乐化对传统体育生态的侵蚀。尽管体育产业拓展了体育的生存空间,但需谨防资本逻辑对其文化内核的侵蚀。近些年新兴的武术兵道项目,大量套搬韩国海东剑道的包装与规则,就属于商业功利主义驱动下的机械移植的典型例子。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试图通过简单的“商业复制”来走捷径的做法,不仅无法建立项目的文化认同,反而在全世界面前模糊了中国武术独特的文化辨识度,这是文化主体性的主动放弃。若放任低俗的商业表演与虚假的“大师”营销泛滥,将会抽空传统体育的道德内核,对其公信力造成毁灭性打击。传统体育的生命力植根于“在场”的体验与文化的浸润,而非单纯的眼球经济。保护这些项目,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避免其沦为缺乏灵魂的资本玩物。

归根结底,传统体育项目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治

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其核心在于强化行政服务意识,确立专家主导的治理机制。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丰富,涉及历史、医学、民俗等多个学科,非单一的行政指令所能涵盖。政府职能部门应当从微观的技术管理中抽身,转而致力于搭建平台、提供保障与核准标准,将具体的技术评定、段位考评、流派认定等核心权限,切实下放给具备深厚学术素养与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唯有尊重专业,让懂行的人办懂行的事,方能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乱象,确保武术、气功、民俗体育等项目沿着符合自身文化规律的道路健康前行,回归其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的本位。

4 在开放交流与批判反思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体系

学术研究不仅是构建运动项目文化观的理论基石,更是衡量中国体育是否具备全球文化解释能力的标尺。长期以来,中国体育的改革实践波澜壮阔且独具特色,提供了诸多足以改写世界体育版图的鲜活案例。然而,面对如此丰厚的实践土壤,相应的理论研究却呈现出自主话语体系的供给不足,往往局限于对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或对已有概念的验证,导致中国体育常处于“有体无魂”的境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要确立中国体育的学术主体性,即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并向世界提供蕴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在此进程中,必须直面阻碍理论升华的两个深层次问题,一个是学术流派的不成熟与理论研究的表层化。

首先,中国体育学界亟须培育具有独特学术主张与方法论的多元学术群体。学术发展的活力源于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对话与争鸣。中国学术传统素来多元共生,正是儒、墨、道、法诸家思想的激荡,才成就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正是程朱、陆王的义理之辩,才铸就了宋明理学的高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体育研究虽然在成果数量上呈现井喷之势,却鲜见具有中国特色且在国际上具有辨识度的学术流派。研究者习惯于跟风式的热点追踪,缺乏几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精神,造成知识结构呈现出同质化与碎片化的特征。构建运动项目文化观,应避免一言堂,而需要学者们基于本土实践,形成多元理论视角与学术共同体,通过理性的争鸣推动学科的演进。

其次,研究工作必须回归实事求是的学风,警惕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尖锐批评过所谓的“宏大理论”倾向,即用晦涩难懂的概念构建起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体育研究中并不鲜见。当前,学术

研究中存在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即部分研究者热衷于对简单问题进行复杂化包装。在一些论文中,充斥着大量未经消化的西方译入概念,或者是缺乏实证支撑的自造新词。研究者们往往沉溺于在二手文献的故纸堆里进行概念游戏,用繁复的哲学辞藻去过度阐释本该清晰明了的身体动作或民俗现象,导致文章云山雾罩,既无法指导实践,也让读者不知所云。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学术自信不足的表现。体育研究应回归其基础状态,聚焦于厘清本质属性,扎根田野调查,正本清源,以朴实、精准的语言阐释中国体育的实践。

鉴于此,未来的中国体育理论致力于构建一种双向互构的文化图景。一方面,在借鉴西方现代体育理论时,要将其与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研究武术等本土项目时,要摒弃玄虚的包装,用科学且具有人文温度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输出东方的身体智慧。

5 结语

2026年,中国体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运动项目文化观,既是对过去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亦是未来的体育强国建设校准航向。无论是补足现代竞技项目背后工业文明逻辑的认知基础,还是对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抑或对学术研究风气的整顿,其核心指向都是一致的,就是让体育回归人的本位。

运动项目不应是冰冷的数据流,亦非晦涩的理论场,而应成为鲜活的、温情的、充满智慧的文化生活方式。确立这一文化坐标,使中国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更加独立、自信且丰盈的灵魂,这是这一代体育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百年流变及精神传承

孙麒麟¹, 李荣芝², 丁松¹

(1.上海交通大学 体育系, 上海 200240;

2.上海体育大学 中国乒乓球学院, 上海 20043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斗初心弥坚。从域外传入到国球荣耀,从“初登巅峰”到“一枝独秀”。100多年来,中国乒乓球运动披荆斩棘、奠基立业、勇攀高峰,书写了非凡成就,铸就了伟大精神。但中国乒乓球真正起步与崛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年中华体育总会乒乓球部在北京成立,70多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已成长为一支国际乒坛的真正霸主,是我国竞技体育鲜艳的旗帜,备受国人喜爱关注。其在长

期奋斗中构建起“国球精神”,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其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肖伟光,2023),永远是党与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始终指引着、激励着一代代青年成长奋进。

1 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发展的4个历史阶段

1)传入与初步发展(1901—1948年)。

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帝国主义入侵以及中国自身的“救亡图存”,西方文化得以进入,随着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近代体育的宣传和推广,乒乓球迅速流向学校和社会,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缺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大舞台及无缘国际乒联,与世界乒乓球比赛规则也存在“脱轨”,基本上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经费不足、乒乓球组织的不健全、比赛规则不统一等限制了乒乓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早期乒乓先驱对乒乓球运动的助推功不可没,上海的林泽苍、吴茂卿、陈霖笙等先辈不遗余力(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2),竭力将我国乒乓球运动推向世界。

2)攀登高峰阶段(1949—1978年)。

党与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相应的体育行政管理体系,举国体制保障下的体育事业开始启动,195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乒乓球部,同年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随后在1953年中国乒乓球队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加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并参加了同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从此揭开了中国乒乓球进军世界乒坛的新华章(李荣芝,2021)。鉴于中国乒乓球队在1953—1954年两届世乒赛上的突出表现,开始引起世界其他乒乓强国的关注,新中国也将体育突破的希望转向乒乓球。1958年我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后,唯有将乒乓球成为我国力图打破欧美体育封锁的唯一代表。1959年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上,容国团一举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奖杯,周总理将10周年国庆与容国团夺冠并称为1959年年度两大喜事,中国品牌“红双喜”由此而生(顾光青,1981)。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27届、28届世乒赛上创造了新的辉煌,激发了国民的乒乓球热情,初步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声势浩大的“全民乒乓”也为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建设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1971年的“乒乓外交”消融了中美两国之间20多年的寒冰,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发展进程(徐国琦,2021)。截至1978年将近120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任胜君,2012),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历程,在乒乓球

的带动下,我国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呈急剧上升趋势。

3)迈向卓越阶段(1979—2012年)。

20世纪80年代世界乒乓球运动迎来技战术变革的重要时期,我国在乒乓球技术创新方面执着探索,表现尤为卓著,国际赛场屡次斩获佳绩,有力地推动了乒乓球技术的进步与广泛传播。中国乒乓“征服世界”的同时,也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竞技体育推向世界巅峰,这一时期也奠定了乒乓球的“国球”地位。乒乓球文化开始绽放时代光彩。在1981年南斯拉夫诺维萨德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第一次包揽全部金牌。1984年国家体委要求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奥运战略”,乒乓球受益于这种战略目标和系统化的选才与训练系统,开始走向全面辉煌(屈子圆,2025)。但1990年前后面临严重挑战,1989年开始的连续3届世乒赛未能进入决赛,国际赛事金牌数量的锐减,因此体制改革被提上重要议程,1992年6月23日,在红山口会议上中国乒乓球队从管理及信心方面入手认真反思总结,1993年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在北京成立,1994年我国体育项目向职业化、市场化迈进,中国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成立,提出了在乒乓球队中实行“双轨制”的发展构想。1995年天津第43届世乒赛中国队再次包揽全部7项冠军,用实力重塑中国乒乓80年代的辉煌。1995年12月,视为中国乒乓球运动职业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的首届全国俱乐部赛在珠江小镇举行,中国乒乓球运动开始迈入职业化、市场化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乒乓球的世界影响力,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竞技水平及国民乒乓文化的认同感,也吸引了国外一大批优秀球员来华交流,促进了世界乒乓球文化的繁荣,也有力地传播了中国体育文化。2008年北京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中国队包揽所有乒乓球金牌,开始了统治性崛起的序幕,承载国家荣誉及展现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的乒乓球运动也开创了全民健身新局面。2010年中国乒乓球学院正式成立,为我国乒乓球人才培养搭建了更为完善的平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了4个项目金牌的包揽,传承了为国争光的信念,也让乒乓球成为了新中国几代人特有的集体记忆。

4)国际担当阶段(2012年至今)。

为引领中国体育改革创新,促进乒乓球运动的多元发展,2012年9月中国乒乓球“第三次创业”战略,开始转变乒乓球发展方式,全面服务我国体育强国建设战略。“国球”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号召,全面助力“一带一路”大好格局。2014年中国乒乓球学院卢森堡分院在欧洲成立,同年走进非洲,第二年又走进拉美,2018年中国乒乓球学院巴布亚新几内亚

分院成立。

2017年中国乒乓球队实行“扁平化”管理,同时改革协会的组织架构且对协会成员进行了再分配。2018年,为确保“奥运战略”的实施,落实协会实体化改革,开始成立运动员委员会,建立教练员运动员双向选择机制,国球开始与世界职业体育接轨。2019年4月,中国乒乓球协会管理体制继续深化,设置了10个专项委员会及6个内设机构,推动与行政机关的脱钩,开始迈向独立专业新时代,中国乒乓球的国际话语权及影响力极大提升。这期间中国乒乓球运动坚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乒乓球事业发展与乒乓球产业协调发展战略方针,完善乒乓球社会体育组织的健全以及公众服务体系,统筹规划全民健身活动,注重爱国主义及集体主义精神的宣传与弘扬,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双轨制”运行机制的完善与成熟,积极推进乒乓球社会公益活动,大力开展“乒乓走世界”“国球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回报国家与社会,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乒乓球发展之路,开创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新模式。但随着乒乓球热的兴起,健康体育生态却遭受“乒乓饭圈”侵蚀,2025年6月开始推动国乒改革,以“要办健康干净的乒乓球比赛”的目标,重塑乒乓球健康发展环境。

2 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精神内涵

1) 乒乓球精神就是为国争光。

20世纪30年代我国面临民族生死存亡,但早期乒乓先驱凝聚民族魂的多元力量,乒乓球成为探索“体育救国”的重要途径及方式,鼓舞了当时的乒乓球爱好者,形成了深刻的体育救国理念,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乒乓球精神形成的历史基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乒乓球以独有的体育外交形式成为我国与亚洲、非洲等国家体育外交的主导,1951年开始成立国家队,1952年乒乓球队成立,“乒乓精神”进入孕育阶段。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用过人努力及为国争光精神打破了既有的乒乓格局获得男单冠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勇气与信心。1961年世乒赛,为破解日本刚推出杀伤力极强的弧圈球,“中国乒乓球的强大,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一大批无名英雄甘当陪练,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辉煌默默奉献,“乒乓精神”得到充分体现。1971年承载着国家期待与荣耀的乒乓球以彪炳史册的中美乒乓外交方式,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1981年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李富荣教练,将“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作为带队理念,首次囊括了全部金牌,创

造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奇迹,“乒乓精神”开始被广泛传颂,成为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2012年后中国乒乓球提出“第三次创业”,以乒乓球交往为载体,推广乒乓球文化赛事交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乒乓,世界分享”全球观念,自信担当,激发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认同感,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繁荣发展、文明包容、和平和谐的社会形象。“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你不要这一分,祖国人民要这一分”“胸前的国徽永远重于背后个人的名字”,这些口号都蕴含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21世纪以来,中国乒乓球队求新思变,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在国际体育赛场升起“高光时刻”包含了无数国人的呐喊与努力,对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宋绍兴,2010),它增强了我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2) 乒乓球精神就是永不言弃。

“最后一球未落地,胜负皆有可能”,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追求卓越已融入他们的灵魂。1959年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决赛,容国团在先失一局的逆境下翻盘,3:1击败拥有9个世界冠军头衔的匈牙利名将西多从而登上男子单打最高领奖台,这场胜利将“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深深植入中国乒乓的精神基因。1961年北京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对阵劲旅日本队,徐寅生在对阵野展弥的关键场次中,上演了震惊世界的“十二大板”经典对决,用极致的坚持诠释了乒乓精神的内核。在决赛局,容国团喊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言壮语,中国队终于第一次荣获世乒赛男团冠军。2001年第46届世乒赛男团半决赛,刘国正对阵金泽洙时几乎全场处于比分落后的被动局面,在最后关头连续挽救7个赛点,最终凭借钢铁般的意志赢得胜利,将“不放弃”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度。2019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中国小将王曼昱、孙颖莎在2局落后的情况下,不断调整心态和技术打法,最终以4:2夺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放弃、坚持到底的精神。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单半决赛,马龙对阵奥恰洛夫,在这场七局巅峰对决中,虽然马龙面临多次赛点危机,但“球不落地不放弃”的精神让马龙胜利晋级并在决赛中获胜,成为乒乓球史上首位双圈大满贯选手,印证了“巅峰能战,低谷能熬”的坚守。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樊振东在0:2落后绝地反击逆转对手,为世界奉上了一场“球未落地,皆有可能”的信念之战。2025年全运会女单乒乓球比赛,王曼昱在第六局2:8大比分落后奋起直追,连得8分最终卫冕冠军,展现了“分分必争”的弹性与韧劲。国乒

精神的永动引擎,在于将“不放弃”从口号拆解为可训练的意志模块、可复制的行为范式、可共情的故事符号。始于容国团的“不放弃”信仰力量,成就国球精神不可战胜的磅礴气势。

3)乒乓球精神就是顽强拼搏。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每次挥拍也是汗水的见证,每一次夺冠都是拼搏的勋章,训练场上的自律与坚持,比赛场上的努力与倔强,以不怕战、不畏战,来之即战的精神奏响属于他们的胜利乐章,书写荣耀与梦想。20世纪90年代中国队陷入低谷,适逢1995年第43届世乒赛天津举行,男队王涛、丁松、马文革不畏强敌绝地反击,最终击败老对手瑞典队重夺阔别6年的斯韦思林杯,女队也夺得团体冠军,中国队用拼搏重拾信心、重返巅峰。2016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带伤作战的张继科忍痛完赛并取得胜,在1:2落后的逆境下以“为国争光,拼了”的信念震撼全场,彰显了“国乒人”的拼搏底色。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单半决赛,孙颖莎面对伊藤美诚的强势反扑,其不屈不挠、展现铁腕精神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以4:0的比分为中国队锁定女单金牌。之后的女团决赛,她以“只要站在赛场上,便只有对胜利的渴望”体育精神携手队友强势击败日本夺冠,她用年轻一代的拼搏诠释了国乒精神的传承。像丁宁、马龙、张怡宁等即使获得了乒乓球赛的大满贯,但是他们仍力求不断突破,以一股敢拼敢闯的劲儿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及每一场比赛,“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待何时”是他们奋斗的动力来源。2025年国乒第19次包揽世乒赛女单冠亚军,目前中国乒乓球队已累计23次捧起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在国乒人心中,“国际大赛上获得亚军就是失败,国乒就是奔着冠军去参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坚守之下,国乒的辉煌战绩和崇高荣耀被不断创造,成就了这支中国体育军团当之无愧的王牌之师,中国乒乓健儿在几十年争先夺标的征程中,孕育出了“胜了从零开始”“打出风格、打出水平”等一系列精神和理念(钟秉枢,2019),激励着更多人前赴后继。

4)乒乓球精神就是善于传承。

从容国团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开始,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就接连不断地努力,迎难而上,一次次刷新历史,创造新的记录。这些荣耀都属于真正的永不言弃的乒乓球逐梦者在每个清晨踏碎星光开始训练,对乒乓球技术打法的精雕细琢,认真钻研,在千万次跌倒中坚守“台下十年功”的执念,以及不断吸取前辈大赛经验所换来的回报。中国乒乓球队的代际传承,早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传承的典范。从中

国乒乓球队第一代教练梁焯辉到现今国乒男女主教练王皓及马琳,历代教练以创新技术和铁血管理让国乒长盛不衰。从第一代总教练傅其芳确立“快准狠变”的打法,带领弱旅的中国崛起,到徐寅生强调“以攻为主”的技术革新,带领国乒走出“文革”低潮;从李富荣确立“直板快攻结合弧圈”技术体系,历史上包揽第36届世乒赛所有金牌,到许绍发推动“前三板”精细化,提升对抗欧洲队的能力;从蔡振华“以赛代练”模式,重振国乒辉煌,到刘国梁“推动大数据分析 & 心理战”,确立国乒霸主地位;从李隼重点培养新生代,稳定队伍,延续女队统治力,到王皓优化“技术全面化”,全面对抗日本冲击。一代代教练员,从张燮林、许绍发、陆元盛、施之皓、秦志戩,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从容国团、庄则栋、王传耀、周兰荪、郗恩庭、梁戈亮、郭跃华、江嘉良、王涛、陈龙灿、王励勤、孔令辉,到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从邱钟惠、林惠卿、郑敏之、胡玉兰、陈静、曹燕华,到邓亚萍、乔红、李菊、王楠、张怡宁、丁宁、李晓霞、刘诗雯、陈梦、孙颖莎、王曼昱,国乒的荣耀背后,是一代代教练将自己赛场多年摸爬滚打获得的经验,转化为队员们通往巅峰的阶梯,是将“坚持、专注、突破”的“体育生命”转化照亮后辈前路的光。当年年轻运动员带着前辈的嘱托及希望走上赛场,他们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梦想,而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未来及民族振兴的期望。这份薪火相传的力量,不止于胜负的生命赞歌,而是照亮前行的凝聚明灯,也是一群人跨越时光的精神共鸣。

5)乒乓球精神就是责任担当。

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乒坛崛起后,认识到乒乓球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世界,需要以胸怀世界的崇高目标及眼光,与时俱进。乒乓球界开始跳出“乒乓”看乒乓,以“大乒乓球观”来促进中国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全面提高及可持续发展。徐寅生1995年当选国际乒联主席,是乒界“大球革命”的最早倡导者。针对当时中国“一家独大”推行乒乓球规则改革,“胳膊肘外拐”,试图打破中国对世界乒坛垄断的作法,为中国人树立了“敢为人先、海纳百川”的良好形象。2009年蔡振华推出“养狼计划”,强调加强国际协作,亲手打造培养“对手”,以推动乒乓球运动均衡发展,具体包括通过输出技术与教练,主动培养外国运动员及竞争对手,正如刘国梁所言:“我们养的是对手,更是整个乒乓球的未来。”“养狼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核心乒乓球技战术体系外流,形成了“群雄逐鹿”的竞争态势,倒逼中国队不断创新,避免故步自封的畏缩不前。但也收获了从零和博弈到全

球分红,以及全球乒乓球规则话语权的提升,乒乓球文化输出也获得新突破,中国乒乓成为国家体育的名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的实力和文化魅力。2013年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站在全球化的视野,审时度势,认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不应该局限于赛场的统治地位,而应该助力乒乓球运动在全球的蓬勃发展,进而提出“中国乒乓,世界共享”的理念。这展现了中国乒乓球队自信与包容,也表现了我国“让乒乓球成为连接世界的通用语言”的责任和担当。2014年中国乒乓球学院欧洲分院成立及2018年大洋洲巴新训练中心的诞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新期间视察,称赞其为“民心相通”典范。在不断的“请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乒乓文化正逐渐深入人心,很多外国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见证者。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格局,既体现了对全球共同挑战的责任担当,也凸显了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全球进步的战略定力。

3 结语

乒乓球百年奋斗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轨迹与方向,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育之路,以辉煌的战绩及穿越时光的震撼力照亮了民族崛起及复兴的前进之路,中国乒乓球队从萌芽、崛起、辉煌到引领世界,全方位显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跨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乒乓球运动应以服务“健康中国”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中国乒乓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系统谋划、改革创新,增强文化自信,坚定必胜信心,集中精力,排除干扰,充分发挥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多重价值,继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强国建设及民族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磅礴精神力量。

(本文通信作者李荣芝)

篮球项目文化观:

历史传承·体系构建·发展路径

王家宏

(苏州大学 东吴智库,江苏 苏州 215006)

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篮球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篮球文化建设。篮球文

化建设已成为促进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引擎,为推动“三大球”振兴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1 篮球运动的历史传承

1)全球化——历史溯源:从游戏到运动的百年历程。

1891年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从儿童投篮游戏中汲取灵感创编篮球,这一源于民间智慧的创造,展现人类对身体协作与竞技表达的文化诉求。1932年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的成立,以统一规则构建起跨文化对话的框架,让篮球突破地域限制,成为统一的体育语言。1936年柏林奥运会将其纳入正式比赛项目,更使不同文明形态在竞技体育舞台上实现深度交融。美国“梦之队”在奥运会上的精彩亮相,不仅展现篮球运动的精湛技艺,更推动NBA篮球职业联赛全球化发展,让篮球成为跨越年龄、性别与种族的文化纽带。

2)本土化——中国传播:从传入到发展的百年变迁。

中国篮球运动以“引进来”吸收国际养分,以“走出去”彰显本土特色,既延续跨越国界的竞技精神,又沉淀出承载民族情怀、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内核。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中国,从《天津公报》首载赛事公告启蒙之初,远东运动会夺冠振奋民族精神;到抗战时期,“战斗”篮球队以球励志,让篮球成为传递爱国情怀、提振民族士气的载体;再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男女篮球队在世界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中国篮球训练、竞赛改革等等,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社会发展;面向新时代,职业篮球、校园篮球、社会篮球蓬勃发展,构建起竞技篮球与大众篮球共生的文化生态,夯实了篮球运动的社会基础。

2 篮球项目文化的体系构建

探索篮球项目文化体系构建,其意义在于将零散的篮球文化认知整合为清晰体系,进而梳理篮球项目文化发展的脉络。篮球项目文化体系构建“四个维度”的逻辑关系,以内涵为逻辑起点,通过剖析特征,进而探讨功能,最后阐释价值。“四个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构成篮球项目文化体系构建从“传承”到“融合”再到“发展”直到“创新”的由内涵到外延的逻辑理路,进而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篮球项目文化的体系框架(见图1)。

1)篮球项目文化的内涵。

体育文化是人类体育实践积淀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以身体运动为核心的表现形式的文化。运动项目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特质与载体,是运动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篮球项目文化既

承接其核心要义,又以“塑魂”“强基”“融合”为内涵,进而回答篮球项目文化“是什么”的根本追问。

(1)塑魂:锚定精神本质,铸就文化内核。“塑魂”是篮球项目文化内涵的核心标识,回答“篮球项目文化的精神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其核心是将中华体育精神与时代价值融入篮球实践。以“南开五虎”爱国精神、“抗战时期”篮球红史、八一男篮的冠军之路、“中国男女篮”在世界大赛上历史性突破等为经典事件,诠释中国篮球运动的爱国精神,为篮球文化自信“塑魂”。

(2)强基:夯实学术支撑,构建知识体系。“强基”

是篮球项目文化内涵的理性保障,回答“篮球项目文化的学术根基是什么”的问题。其核心是构建与丰富篮球项目文化的理论研究,使篮球项目文化从“经验感知”走向“理性认知”,为篮球文化研究“强基”。

(3)融合:拓展实践形态,激活发展动能。“融合”是篮球项目文化内涵的拓展延伸,回答“篮球项目文化的实践形态是什么”的问题。其核心是通过跨域协同,让篮球项目文化从单一运动形态向多元生态延伸。体教融合聚焦后备人才培养、体卫融合紧扣运动健康促进、体旅融合贯通城乡篮球赛事,通过多元融合丰富篮球文化实践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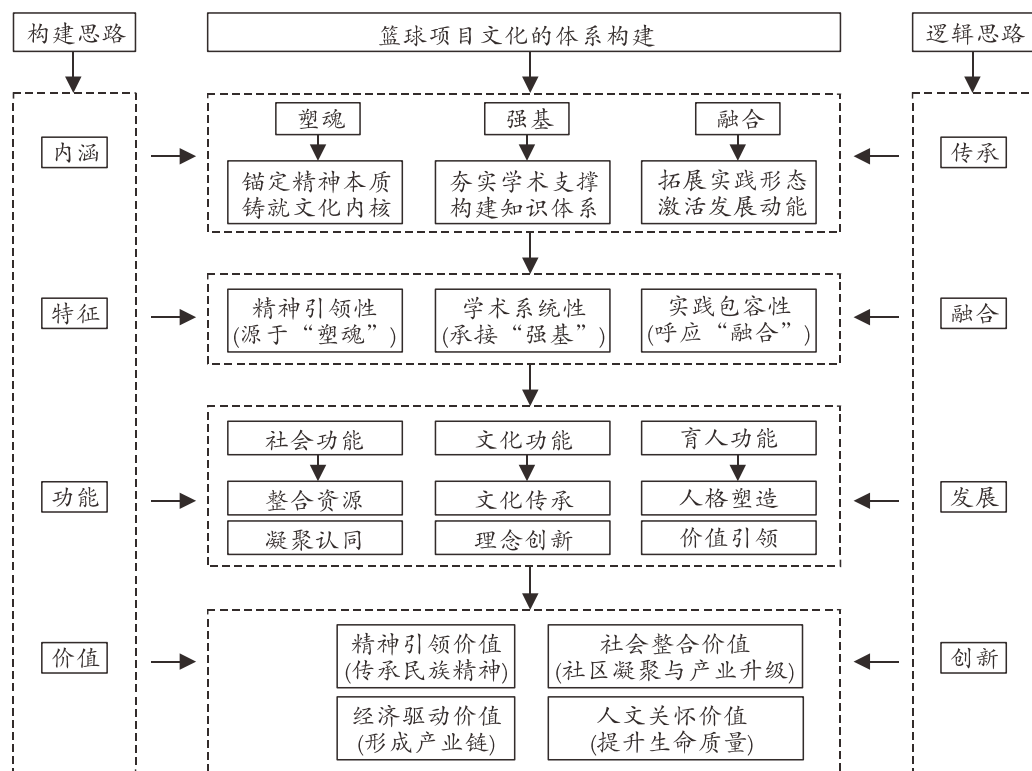


图1 篮球项目文化体系构建框架

2)篮球项目文化的特征。

篮球项目文化的特征是“塑魂”“强基”“融合”等核心内涵的外在呈现,凸显了篮球文化的独特属性,系统地回答“篮球项目文化有什么”的问题。一是精神引领性。这一特征源于“塑魂”的核心内涵。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为价值导向,通过篮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人物事迹、赛事场景等转化为可感知、可感召的精神力量。二是学术系统性。这一特征承接“强基”的理论研究。以多学科交叉为支撑,以史料考证、数据核验、理论提炼为框架,通过学术研究实现篮球文化传播脉络、发展规律、改革逻辑的清晰梳理。三是实践包容性。

这一特征呼应“融合”的内涵导向。将篮球文化贯通于体育与教育、卫生、旅游等融合场景,形成全民参与、跨域协同、业态多元、价值共生的文化生态。

3)篮球项目文化的功能。

篮球项目文化不仅具备丰富的内在属性与鲜明特征,更通过其外化的社会性、文化性与教育性活动,在实践中发挥出多方面的现实功能,具体回答了篮球项目文化“做什么”的核心问题。

(1)社会功能。篮球项目文化在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群体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在区域发展层面。“村BA”“浙BA”等群众性篮球赛事通过“体育+”模式,将体育元素深度融入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

赛事引领的多元发展模式,促进城乡资源互动与文化融合。二是在社区建设层面。基层篮球赛事既促进居民社会互动,又强化社区认同与归属感,为全民健身战略实施提供社会基础。

(2)文化功能。篮球项目文化承担着文化传承与理念创新双重使命。一是学术研究层面。以苏州大学连续举办4届“中国篮球文化论坛”为代表,系统推进篮球文化的理论研究与知识传播。二是制度构建层面。《中国篮球文化建设纲要》的颁布实施,将“文化篮球”提升至战略高度,提供篮球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文化引领。三是地域文化层面。北京首钢“战斗精神”、新疆广汇“边疆底色”,将地域文化转化为认同符号,实现篮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3)育人功能。篮球项目文化是践行“以体育人”理念、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一是在人格塑造方面。篮球运动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品质、团队精神与规则观念等,塑造坚韧、担当、纪律等品格。二是在价值引领方面。通过设立中国篮球名人堂的“中国篮球先行者”“优秀集体”“中国杰出运动员”“中国杰出裁判员”等入堂仪式,实现体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承。

4)篮球项目文化的价值。

在明确篮球项目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后,其价值体系旨在界定篮球文化最终“成什么”的核心议题。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篮球文化已超越单纯的竞技层面,正在彰显其在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的多元价值。一是精神引领价值。篮球项目文化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一价值将中国篮球运动发展历史与当代实践相结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精神滋养。二是社会整合价值。篮球项目文化通过基层赛事促进社区凝聚,以职业联赛推动体育产业升级,同时借助国际赛场促进交流沟通,彰显篮球运动在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价值。三是经济驱动价值。以CBA、CUBAL、村BA等篮球品牌赛事为核心,形成了涵盖赛事运营、媒体传播、衍生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将文化影响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四是人文关怀价值。篮球项目文化倡导健康、时尚、活力的发展理念,通过提升生命质量、丰富精神生活,使篮球文化成为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篮球项目文化的发展路径

第一,强化时代传播,构建多元立体文化传播格局。一是讲好中国篮球故事。既要讲述中国篮球运动在百余年发展历程所凝结的经典记忆,也要讲述中国男女篮球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还要讲述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群众篮球运动的广

泛开展,让世界看到中国篮球背后的历史积淀、精神追求与社会价值。二是拓展数字传播渠道。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开发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型传播形态,增强篮球文化传播的互动性与沉浸感。既要参与国际篮球赛事的合作交流,也要通过自主创办国际赛事等渠道,建立中国篮球文化的对外传播体系。

第二,夯实后备培育,完善体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加强体教融合。在校园篮球普及中注入文化导向,通过校内联赛、体育课等渠道培育青少年对篮球运动的兴趣与认同,同时将体育精神融入学校德育,做到以体育人、以文化人。二是完善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强化梯队建设和基层培训,注重全面发展,引导年轻运动员既练就精湛球技,又锤炼品德修养和爱国情怀。通过文化浸润,让新一代篮球人既有竞技实力,也有文化素养和责任担当,成为篮球文化的坚定传承者和弘扬者。

第三,丰富赛事体系,打造多层次的赛事活动平台。一是职业赛事方面。提升CBA等职业联赛的竞赛水平与品牌影响力,打造高质量、具有文化感召力的职业联赛,使之成为球迷文化的核心载体。二是校园赛事方面。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校级联赛和班级联赛,以育人为核心价值,发挥体育竞赛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三是群众赛事方面。形成“省—市—县—乡”四级联赛体系,实现篮球赛事对各地域、各阶层人群的全覆盖。建立起梯次分明、相互衔接的赛事体系,既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观赛和参与需求,又为篮球运动文化提供持续生长的沃土。

第四,推进治理升级,健全规范化的治理保障体系。一是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篮球协会、联赛公司、地方体育部门等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合力推进的管理格局。二是严格赛风赛纪管理。建立严厉透明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坚决抵制赛场暴力、假赌黑及畸形“饭圈”文化等不良现象,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三是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将体育精神和职业规范纳入俱乐部、联赛的评价考核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篮球生态,为文化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第五,深化协同融合,拓展跨领域的发展空间。篮球文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行业藩篱,实现跨领域的协同合作。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篮球与文化、教育、旅游、健康等领域融合共生,构建“优势互补、价值共创”的融合生态。篮球文化铸魂为融合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体育聚势搭建资源聚合平台,商业赋能激活市场动能,旅游搭台拓展空间场景,健康筑基锚定民生导向。通过“篮球+”,实现体育资源与其他领域

的价值共创,扩大篮球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价值。

第六,坚持科学训练,形成“四位一体”训练体系。竞技水平是体育文化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提高篮球竞技实力需要依靠科学训练。一是要加强运动训练的科技支撑。运用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优化训练方案,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效率。二是要注重精神训练和团队文化建设。在训练中培养队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用篮球文化激励斗志、磨砺意志。通过塑造团队文化,确保队伍在逆境中依然团结奋进。

第七,强化学术自主,构建中国特色篮球话语体系。高度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一是支持篮球运动文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设立专项课题与研究基地,深入探索中国篮球运动发展规律与文化特质,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二是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传播中国篮球运动文化研究成果,提升国际话语权,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三是持续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篮球文化论坛、期刊专题等交流平台。以博物馆和档案馆为载体,形成研究、传播和保存的完整链条,为篮球文化可持续发展夯实学术根基。

展望“十五五”新征程,中国篮球项目文化建设需以历史传承为根、以体系构建为纲、以发展路径为翼,用生动的叙事讲好中国篮球故事,既让篮球运动成为全民健身的活动方式、立德树人的实践载体,更让其承载的爱国情怀、拼搏精神等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助力强国建设的持久动能。

足球文化的历史传承、精神

内核及学术自觉

任定猛,王丰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足球运动学院,北京 100081)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是体育历史载体、社会镜像与民族精神象征。《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核心使命是通过足球传承文化、弘扬精神,传播正能量。在我国足球改革中,应构建中国特色足球文化,它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足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1 足球文化的历史传承

1) 足球的起源与现代转型。

全球丰富的足球文化中,古代中国的“蹴鞠”、罗马的“哈巴斯托姆”(harpastum)、希腊的“埃佩斯卡洛斯”(episkaros)、意大利的“吉奥库迪·卡利西奥”(gioco de calcio)是最具代表性的古代足球样态。其中,中国蹴鞠发展最为系统,且影响深远。2004年国际足联确认中国淄博临淄(蹴鞠发源地)为世界足球发源地。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时期已成为民间娱乐。汉代被纳入军事训练内容,在唐宋时期最为繁荣,在组织、规则、场地、器材方面更为完善。当时的足球组织“齐云社”制定规则和礼仪,承载着“礼乐教化”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1863年英国足协制定《剑桥规则》,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提供条件。1888年英格兰足球联赛的创立,推动足球标准化、职业化;1930年首届足球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使得足球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符号。

2) 全球传播与本土化适应。

现代足球通过英国殖民、贸易与文化交流向全球传播,呈现“被动接受—主动适应”的本土化形态,历程分为3个关键阶段:(1)殖民扩张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将足球带入其殖民地(巴西、阿根廷、印度),巴西人将桑巴舞的节奏感、热情、即兴发挥融入足球,形成独特的“拉丁”技术风格。(2)战后全球化时期(20世纪中期),被称为现代足球战术变革期,国际足球通过3次“战术革命”,不断创新阵型、更新打法,进一步提升足球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性。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首次实现全球范围电视转播,成为跨文化的重要桥梁。(3)商业化与数字化时代(21世纪至今),以英超为代表的欧洲五大联赛,成为足球文化输出的核心载体,网络媒体重构球迷互动模式,打破地域壁垒形成“全球球迷社团”,体现“融合—创新—引领”进阶形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借助不同摄像机位转播,为球迷提供多视角观赛机会,技术赋能让足球传播进入全新阶段。

3) 中国足球的本土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依托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成立了专业体制的足球“办训模式”,形成三级训练竞赛体系,当时的足球文化更多以“技术风格”的形态被传播,塑造南北不同地域流派特色的技战术风格。南派以广东队为典型,注重个人技术和小范围配合。北派以辽宁队为代表,球员高大强壮,对抗性和力量好,注重长传冲吊和空中优势。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足球比赛推动全国普及;60年代国家队在亚洲赛场屡创佳绩。同时,在举国体制下,足球不仅是竞技项目,更凝聚了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容志行等球员践行“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志行精神”,成为民族精神象征。1994年职业化改革后,各队引入外籍教练与球员。2004年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改制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超),技战术风格向融合方向发展。2015年足球成为国家战略,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应坚持域外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探索构建本土化的风格和特色。

2 足球文化的精神内核

1) 核心理念。

从本体论视角分析,竞技层面的足球运动是团队运动的集中展现,它要求竞赛过程公平公正,倡导在赛场上顽强拼搏,以及包容共享的体育风尚。从社会价值层面分析,足球运动促进爱国主义培育、团队意识深化与积极人生态度养成,助力构建民主、法治、竞争、合作的现代社会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检验手段与传播工具(郑萌,2015)。从文化属性看,足球运动的精神塑造功能被视为一个国家在足球实践过程中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指出:“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体现了足球运动本质在于促进人类身心整体协调发展的观念,尤其凸显足球运动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足球运动发展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传统,包括“志行精神”诠释无私奉献与团结协作;中国女足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佳绩,被誉为“铿锵玫瑰”的中国女足展现出“永不言弃、敢打敢拼”的女足精神。这些精神也是中华体育精神在足球领域的延伸,是推动足球普及发展的内在动力。

2) 多元社会功能。

足球运动除具有健身和娱乐功能以外,还承载多维度社会功能。其一,教育功能。校园足球是“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国家积极发展足球特色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训练、竞赛活动,培养青少年社会规范性、价值观与个性(赵薇,2020)。其二,国际交往功能。卡塔尔世界杯、沙特阿拉伯申办2034年世界杯,均为提升国际形象,以及加速能源大国向服务型国家的转型;首都北京“双奥”成功举办彰显文化软实力,可结合“一带一路”构建“足球+文化”的对外传播载体。其三,经济功能。足球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023年夏季,贵州榕江“村超”吸引各地游客519万人次,旅游创收59.86亿元,推动着当地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快速发展。2025年,“苏超”备受瞩目,带动江苏省游客消费总额达46.93亿元,同比增长0.2%(南京市人民政府,2025)。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足球赛事活动,为社会经济增量和文化赋能。

3) 独特文化符号。

足球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载体之一,其精神内核通过文化符号具象化。首先,队徽、队衣与队旗是身份认同符号,是足球文化直接视觉标识,背后“所指”包含时代性等共性(浦义俊,2015),是集体身份文化锚点。历届世界杯冠军球队可在队徽上加星标,强化身份认同。其次,大力神杯是终极价值符号,“能指”是足球殿堂终极价值,“所指”是人类对梦想等的共同追求,是运动员精神图腾。最后,裁判员哨音是足球秩序符号,不同哨音“能指”明确,“所指”是足球界“法律之声”,维护公平竞赛。这些符号相互交织,身份符号锚定群体身份,价值符号承载共同梦想,秩序符号守护公平底线,共同编织足球文化精神内核——团结、激情、公平,让足球成为跨越文化壁垒的全球精神纽带。

3 中国足球文化研究的学术自觉

1) 研究历程三阶段。

基于历史的传承和精神内核的价值引领,中国足球文化研究需要通过学术自觉构建本土知识体系,回应实践中文化融合难题。纵览我国足球文化研究,其发展历程历经3个阶段:(1)萌芽探索期(2000—2010年),国内学者基于对外文的翻译,以构建基础理论作为切入点,聚焦足球文化对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魏忠等,2002)、内涵(肖子亮,2004)、文化重建(燕成,2008)等,旨在为我国营造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生态环境。(2)深化拓展期(2011—2018年)研究领域覆盖校园足球领域(侯学华等,2013、2014)、地域文化与非遗(李成龙等,2018)、中外足球文化比较研究(浦义俊等,2014),研究成果注重史料的挖掘和实践案例结合,彰显本土化特征。(3)自主建构期(2019年至今),强调多元价值与实践创新,钟秉枢等(2022)提出7大多元价值体系,丁显明等(2023)用扎根理论构建文化记忆模型,白宇飞等(2025)提炼“苏超”成功经验,上述足球研究文献体现多学科交叉与治理创新成为核心。

2) 自主知识体系成果。

我国足球文化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本土化的自主知识成果,初步构建起中国足球文化知识体系。在理论构建层面,足球研究者从借鉴国外文化分析理念、研究国外足球文化特征,到国家政策导向下研究中国足球在不同领域困境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在教材方面,何志林主编的《现代足球》兼顾专业教学与普及应用需求,成为体育院校的经典教科书。体育教育专业所

涉及的《球类运动——足球》教材,目前已更新至第 4 版,且配备教学篇和训练篇的配套教材。在“体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校园足球文化研究已构建具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并产生一系列论文研究成果,为推动校园足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郭振等,2022)。在足球研究史料发掘层面,探寻古代蹴鞠向现代足球的演变轨迹(张孟杰,2015),梳理梅州客家足球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张长城等,2015),研究朝鲜族足球所蕴含的农耕文化与抗日战争历史积淀(李成龙等,2018),填补本土史料空白。在足球研究方法层面,运用符号学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王文军,2007)、体育人类学(庄孔韶,2018)、扎根理论(丁显明等,2023)等跨学科方法,突破单一研究范式。在实践应用上,地域足球赛事文化现象的剖析,例如,贵州村超(张晓辉,2025)、江苏苏超(王智慧,2025),提炼“好政策+有效执行+有力监督”架构,以及多主体合作深化激发的社会活力等区域办赛经验。这些成果从理论到实践,为本土足球文化发展提供支撑。

3)未来研究方向。

一是多学科交叉深入,结合历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综合研究方法,丰富理论维度。二是实践创新跨领域和区域的适配,以竞技足球、校园足球及全民健身等现实问题为导向,探索不同领域足球文化的特性,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体系。三是文化认同和国民性塑造,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体育精神对中国足球文化的影响,进而探讨其对国民性塑造的作用。四是制度与治理完善,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完善不同领域足球制度,形成现代足球治理体系。五是数字传播与记忆保存,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足球文化传播,构建足球新媒体传播体系,保存足球文化历史,提升足球文化效能。

网球运动文化观:

历史传承·精神内核·学术自觉

刘青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41418)

网球文化是指参与、组织和观赏网球运动的人,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成果化凝结,是网球运动的

知识、技能、习俗、制度和观念的总称,其核心是网球价值观的群体共识,其实质是网球运动的制度化、和谐化、品味化。从宫廷贵族的消遣娱乐到大众参与的全民健身运动载体,从单纯的竞技比拼到承载多元价值的文化载体符号,网球运动的发展轨迹深刻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我国,网球运动历经百余年的引入、推广与发展革新,从最初“小众”运动项目逐步走向“大众化”,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球项目文化。

1 网球运动的历史传承

关于网球运动的起源,学界虽存争议,但普遍认为其最早可追溯至 12—13 世纪法国北部修道院的“掌球游戏”,修道士在修道院的回廊中用手掌击打布球。现代网球凭借独特的竞技性与趣味性的融合,迅速在欧洲范围内传播。1877 年英国温布尔登网球赛的前身举办了首届草地网球锦标赛,对网球项目进行了标准化改革,到 1913 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式举办,“四大满贯”共同构成当今全球网球运动最具影响力的赛事体系,成为推动网球运动全球传播的重要核心载体。

20 世纪初,网球运动开启国际化进程。1913 年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法国巴黎成立,标志网球运动进入规范化、国际化发展阶段。ITF 积极推动各国网球交流合作,统一全球赛事规则与裁判标准,为网球运动全球普及奠定坚实基础。1968 年允许职业球员参赛,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与女子网球协会(WTA)分别在 1972 年和 1973 年成立,建立起了职业网球的组织框架。此后,网球运动商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各类赞助商介入提供充足资金支持,推动了运动技术革新与装备升级。

网球运动传入我国,最早的网球场记载是 1860 年英国侵略军在天津紫竹林修建的练兵场附属网球场。1885 年英国商人在上海修建我国首片网球场,标志着网球运动正式登陆中国。20 世纪 30 年代,女性开始突破封建束缚参与赛事,1930 年的第 4 届全运会已有 11 名女性报名网球项目,成为社会进步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网球运动逐步推广,开始兴建场地、组建专业网球队,积极开展和参加国内外赛事。1953 年天津举办包含网球的 4 项球类运动会,1956 年首届全国网球锦标赛举办,逐步建立起多元赛事体系;1958 年我国首次派选手征战温网;1959 年首届全运会网球赛盛况空前。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各种赛事与对外交流一度拓展。1972 年后,在“乒乓球外交”推动下,部分省市网球项目优秀运动队曾一度恢复并组建临时国家队开展对外交流,1975 年举行

的第三届全运会网球比赛,是这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网球盛会。改革开放后,网球运动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1981年我国恢复国际网球联合会合法席位,重新融入全球网球体系。国家网球队在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赛事中崭露头角,一度位居亚洲领先地位。1986年李心意斩获汉城亚运会女单金牌,成为中国亚运会网球单打首金得主;1990年中国队跻身戴维斯杯世界组附加赛,同年在北京亚运会网球项目上斩获3枚金牌。此后我国成功承办北京国际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国际赛事,既为本土选手提供与世界顶尖选手竞技的平台,也极大激发大众参与热情。

21世纪以来,中国网球取得历史性突破。2004年李婷、孙甜甜斩获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实现网球项目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11年李娜获法网女单冠军,成为亚洲首位大满贯单打冠军;2024年郑钦文夺得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中国网球队以1金1银创下亚洲网球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战绩,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受此影响,网球在大众健身、体育产业等领域快速发展,社区、公园、学校等网球场不断改善,培训机构与俱乐部蓬勃发展。中国网球的发展路径从“精英贵族导向”到“竞技推动”再到“大众普及”的阶段性发展。

2 网球运动的精神文化

1) 网球运动的核心价值理念。

公平竞争是网球运动的核心价值理念。网球运动拥有系统完备的规则体系,对场地标准、器材规格、裁判准则等均有明确界定,为赛事公平性提供制度保障。在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中,公平、公正的追求主要通过保持判罚结果的相对准确性体现。

尊重与包容是网球运动的重要价值维度。运动员既要尊重对手的竞技表现与努力付出,也要尊重裁判判罚权威与观众观赛权益,胜不骄败不馁的姿态彰显高尚体育道德。甚至观众也需遵守“安静观赛”规则。网球汇聚不同区域、民族与文化背景参与者,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包容共生,形成开放包容文化生态。

坚韧不拔与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是网球运动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球比赛实际上是一场“孤独”的比赛。在单打比赛中球员需独自上场,一切决策的失误与成功都由自己承担。这极大培养了运动员的自律、独立思考能力和强大的心理韧性。网球比赛往往耗时较长,对运动员的体力、耐力和心理素质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网球运动中有经典“抢七”和长盘制比赛,这说明在赛场上没有平局,必须决出胜负。这对

运动员的意志和体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网球运动员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个性、自我、进攻的竞技精神,在比赛中表现出很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带有极强进攻性,也正是这种特性让他们传递了网球运动的一种不断超越自我、敢于挑战的精神。

2) 网球运动的社会功能。

网球运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首先,长期的网球训练可提升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其次,网球比赛能培养参与者的心理调整能力,历练冷静、坚韧、抗挫等品质。此外,网球运动还能提升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双打比赛中两名运动员的密切配合、相互沟通与协作过程,契合了素质教育中社交能力培养的核心需求。

作为一项全球运动,网球赛事为各国人民提供交流平台。各国的独特文化通过网球赛事得以展示和传播。例如,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传统着装要求、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浪漫文化氛围等,都成为各国文化展示的名片。通过网球运动的交流,不仅促进体育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与发展。

随着网球运动普及度与商业化水平持续提升,网球产业已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展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其涵盖赛事运营、装备制造、场馆运营等多个领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与经济效益,契合“提振消费”的需求。如“四大满贯”等顶级赛事持续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住宿、装备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各类网球培训、俱乐部蓬勃发展,进一步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网球运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高社交价值,对个体社交关系的构建具有显著意义。其一,网球通过双打协作、礼仪化互动及半开放场地设计,创造低压力社交场景;其二,网球运动具有跨年龄、跨职业、跨社交圈的普适性,成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纽带。网球社交的本质是通过“运动中的真诚互动”搭建社交平台,其兼具工具理性与情感价值的双重属性,彰显出体育运动在社会联结中的深层功能。

3) 网球运动的独特文化符号。

仪式是网球运动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贯穿网球比赛始终。从比赛开始前的运动员入场、握手致意,到比赛过程中的换边、擦汗,再到比赛结束后的握手、拥抱、颁奖仪式,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仪式不仅体现了对对手、裁判和观众的尊重,也彰显了网球运动的庄重性和规范性。例如,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颁奖仪式上,皇室成员为冠军颁发奖杯,成为了网球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仪式,吸引了全球爱好者的目光。

规则是网球运动的核心文化符号,是网球运动得以有序开展的保障。网球运动的规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已形成一套系统、严谨的体系。从球的落点、发球规则,到得分方式、犯规判罚,每一项规则都明确具体,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网球规则不仅是运动员比赛的准则,也塑造网球运动的文化特质。例如,网球比赛中的“鹰眼”技术,体现网球运动对公平公正的极致追求,成为了网球规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网球运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球文化。如在上海网球大师赛中,赛区特别推出以“马桥十二时辰”为核心的“马桥文化”展览:呈现包括扎染艺术、香炉制作以及紫藤花杯等在内的多种文化创意产品,并且安排了马桥手狮舞这一传统艺术的现场表演,使网球项目与中国传统非遗联通。

3 网球运动学术研究的中国贡献

1)理论建构是网球运动学术研究的根基,中国学者以多学科交叉为突破,聚焦亚洲人群特质推动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创新与国际补白。

传统网球理论多聚焦于欧美竞技体系,难以适配亚洲运动员的身形特点与神经反应特质。中国研究团队精准切入这一空白领域,形成了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论成果。通过可视化工具对2000—2024年核心文献的分析可见,中国学者在网球教学训练、运动控制机制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研究集群,刘青、唐小林等学者的网球相关成果被引突破千次,成为国际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运动科学领域,国内科研团队融合神经科学、生物力学等学科方法,构建了适配黄种人群的网球专项视觉-运动耦合理论框架,首次揭示了不同人种在“感知—决策—行动”闭环中的差异规律,填补了国际网球运动人种适配性研究的空白,有力反驳西方网球“人种论”,为非欧美运动员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2)史料挖掘为网球运动的发展溯源提供关键支撑,中国学界在全球网球史料整合与本土发展脉络梳理中展现独特价值。

网球运动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密码,其规则演变、跨洲际传播等议题的研究需要多元史料的佐证。中国学者不仅系统梳理了网球运动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厘清了不同历史时期网球运动的传播路径、参与群体与文化影响,更牵头组建“东西方网球历史比较研究”国际合作团队,联合英、法、美等国权威史料机构,首次系统梳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

初网球运动跨洲际传播的完整脉络。同时,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强调网球项目发展战略的创新,是中国网球项目持续实现突破的关键前提和基础。在整理网球史料后,中国学者不仅对网球与革命苏区、华侨等历史互动进行探究,完善了网球文化在东方的历史脉络,并立足于“软硬结合、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本土化语境对网球文化进行探究。现代网球运动包含了文明与典雅、动感与野性、张扬与时尚、平等与竞争等文化特性,这与中国自古所蕴含的“中庸和谐”的哲学思想相呼应,为本土发展脉络梳理提供东方内涵。

3)实践应用是学术研究价值的最终体现,中国在网球教学改革、竞技训练优化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实际成效,彰显研究的应用价值与国际影响力。

在教学领域,国内体育院校主导构建分层递进的网球教学体系,将本土原创理论成果转化为标准化的教学方案与评估工具,已在全国300余所中小学、高校推广应用,使基层网球教学的科学化水平提升40%以上。以“多维系统反馈法”“分组合作教学法”“动作技能连续体理论”“静动结合理论”等教学法与理论融入现实网球课程中,助力我国网球教学模式的改革迭新,提高我国网球学生的学习效率、击球成功率和动作的规范性。在数字时代,我国学者已逐步探索“PoseC3D”等数字技术与网球教学的融合,以现代科技助力网球项目、智能穿戴设备辅助教学、高清摄像技术“鹰眼”的运用以及科技助力网球文化的传播。中国学者总结适合中国网球发展的训练体系,并与西方的职业化体制融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网球项目发展体制。基于此,我国学界提出“由专业培养目标向职业培养目标转型”的发展战略:倡导职业化的思想理念、形成职业化的训练思想、实施职业化的训练操作、打造职业化的教练队伍、完善职业化的网球运作、构建专业化的管理体系的有力探索。

中国网球运动的参与人数从2010年不足百万增长至2024年800余万,形成兼具规模与质量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通过网球智能装备制造,实现技术输出,网球装备销售额近两年同比增50%,预计2025年销售总额将超过20亿元,居三小球次席。赛事运营与智能培训平台提升服务创新,2025年中网公开赛,赛事总营收达3.11亿元,并推动网球与文旅、运动装备产业,健康业态融合。这些实践完善了产业链条,为全球网球运动的大众化普及贡献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从填补网球理论空白的视觉-运动耦合研究,到主导全球网球史料整合,再到推动亚洲网球训练科学

化的实践成果,中国网球学术研究已形成“理论—史料—实践”的完整创新链条。当前,研究虽在国际话语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但已明确展现出独特的贡献价值。

4 未来畅想

网球运动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文化演进史,从法国宫廷的掌球游戏到全球普及的竞技运动项目,并在全球开枝散叶。在我国,网球运动历经百余年的本土化发展,从最初的小众运动逐渐走向大众化,形成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在竞技网球、大众网球、网球产业和网球文化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

未来,将聚焦以下四大方向。其一,深化网球文化跨学科研究,探索数字时代网球文化的传播路径与青年群体认知特征,构建更具时代性的网球文化理论体系。其二,强化竞技网球科学化研究,围绕青少年精准选材、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智能化训练手段应用等关键领域,结合中国运动员生理特质与技术风格,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训练方案。其三,拓展网球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针对本土赛事IP培育、网球装备国产化、体育消费升级背景下的产业创新模式等议题,开展实证研究,为网球产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四,聚焦全民健身背景下的网球普及研究,重点探讨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网球运动适配方案,研究“体教融合”“社区网球空间建设”的长效机制,为网球运动全民普及提供实践路径。同时,需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网球发展经验与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提升我国在全球网球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

从竞渡到育人:

中国游泳文化的转向与重构

黄波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带学生去广东信宜一所乡镇小学开展游泳教学试点时,校长拉着我的手说:“黄老师,我们学校建不起泳池,但孩子们每年暑假都有下河玩水的习惯,去年差点出事。”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真正思考:游泳在

中国,到底该教什么?又为谁而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游的快一点,再快一点。泳池被简化为赛道,训练变成计时冲刺,评价标准缩成一句冰冷的问话:“成绩是多少?”这种执念,让游泳这项本可涵养人格的身体实践,异化为夺金的工具。直到近年来,“加强运动项目文化建设”被写入国家文件,我才看到一种可能的转向——游泳或许能从那条只讲速度的赛道上,慢慢走回它本来的位置:一条修身的路,一座育人的桥。

1 蛙泳为何以成为我们的起点?

很多人注意到一个现象:西方儿童学游泳,多从爬泳(自由泳)开始;而在中国,无论是游泳培训班还是学校课程,几乎都以蛙泳入门。有人批评这是“技术落后”,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基于本土现实的教育理性。

2023年在广州黄埔区做调研,一位有20年教龄的体育老师告诉我:“家长最关心的不是孩子游得多标准,而是‘暑假结束前能不能自己游25m’。”蛙泳抬头换气、动作对称、滑行可歇,初学者十来天就能实现基本“游进”。这种“先稳后快、先安后进”的路径,折射出“中式体育教育”注重实用理性、群体秩序与风险规避的文化逻辑。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身体观念的突破。传统社会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及礼教“遮蔽伦理”影响,公开袒露躯体被视为失礼甚至羞耻。而游泳恰恰要求脱去外衣、直面身体,这在20世纪初曾引发激烈争议。随着公共泳池在城市普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全民游泳”运动的推广,国人逐渐从“羞于露体”转向“敢于下水”,进而学会欣赏身体的力量、协调与美感。游泳池由此成为现代公民意识萌发的微观场域——在这里,人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与水相处,更学会了如何正视自我、尊重他人、遵守规则。

值得补充的是,这一转型有其制度基础。早在1910年“全国运动会”就设有游泳项目,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开始系统翻译并制订本土化游泳规则。有学者指出,早期游泳推广始终与“救国强种”绑定,而非竞技表演(王俊奇,2005);郝勤曾强调,中国传统“水德”思想虽未直接催生现代游泳,却为接纳这一外来身体实践提供文化缓冲带。这些历史细节表明,中国对游泳的接受,从来不是被动移植,而是主动调适。

2 泳池,何以成为微型社会?

在深圳一所中学进行教学实验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孩子们刚下水时总想抢中间道次,后来老师

引导他们按速度分道,慢的在外,快的在内,循环游进。几周后,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会主动让道。

这一过程,远不止是“排队游泳”那么简单。从社会学角度看,泳池是一个典型的规训空间。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曾指出,现代学校、军营、医院通过空间划分与时间控制,将个体塑造为“驯顺而有用的身体”。泳池亦如此:8条泳道、统一出发、循环路线,构成一套精密的身体管理装置。个体必须控制“我想游中间”的冲动,服从“你应在第6道”的指令——这不是外部强制,而是通过反复练习,将规则内化为身体记忆。

但中国语境下的泳池,又不止于规训。它同时承载着道德教育的功能。学校应通过集体生活培养“对规则的尊重”与“对他者的责任”。在泳池中,这体现为三重学习:(1)遵守秩序:按道次循环行进,不随意穿插——这是对公共空间边界的认知;(2)尊重差异:有人快有人慢,不必比较——这是对多元共存的接纳;(3)承担后果:呛水了,得自己调整呼吸,没人能替你——这是对自我负责的启蒙。

这些经验,无法通过说教传递,只能在水中亲历。广东将游泳纳入中考,表面考的是100米游泳技能达标,深层却是一次关于风险认知、自我保护与公共责任的公民启蒙。泳镜戴好那一刻的专注,出发信号响起前的静默等待,这些微小仪式,都在无声传递对规则的敬畏。泳池,因此不仅是技能习得场,更是现代公民品格的孵化池。

3 从“能游”到“会育”:师范生三重能力的生成逻辑

过去几年,我们团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师范生真正理解游泳的育人价值。最初,学生以为“会游=会教”,直到学生们在广东云浮乡村学校遇到没有泳池的困境。

怎么办?我们带着学生一起研发可拆卸的移动支架式泳池方案——成本低、搭建快、可重复使用。这个过程本身就成了教学现场,也是师范生专业成长的真实熔炉。

能教学:从技能传授到教育设计。面对零基础乡村儿童,照搬城市教案行不通。学生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把“蛙泳蹬腿”编成儿歌?如何用“吹泡泡”模拟换气节奏?如何在无深水区条件下模拟自救场景?这要求他们超越“我会游”,进入“如何让孩子学会”的教育思维——这正是教学法的生成过程。

能游泳:从个人技能到应急能力。在临时水池中,水质、水温、边缘防护皆不确定。师范生不仅要示范动作,更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孩子抽筋怎么办?水温过低如何处理?这迫使他们将游泳技能转化为真实

情境中的生存与救援能力,实现从“表演性游泳”到“功能性游泳”的跃迁。

能育人:从防溺水到生命教育。最触动我的是一位实习学生的做法:她没有直接和学生讲“不要野泳”,而是组织孩子们画“我家附近的危险水域”,并邀请曾溺水获救的村民讲述经历。孩子们听了整节课眼眶湿润,课后自发成立“安全小卫士”小组。这说明,育人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共情与责任。

这种“问题驱动—实践创新—反思提炼”的闭环,正是教育家杜威“做中学”理念的中国化实践,也暗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传统智慧。师范生在此过程中,完成的不仅是技能叠加,更是教育人格的建构。

4 精神内核的制度化:“干净”如何成为泳道伦理

2001年“九运会”,罗雪娟那句话“我是干净地站起来的”,更多是一种个体良知的呐喊。而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周期,当外媒质疑中国游泳队时,潘展乐、张雨霏的回应方式已截然不同:他们不再情绪化辩解,而是展示世界泳联认可的检测数据、全周期反兴奋剂教育记录、透明化选拔机制。这种转变说明,“干干净净夺金牌”已从道德直觉升华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

更值得重视的是赛场之外的细节:接力项目中的默契配合、公开水域选手间的互助、赛后同对手的尊重致意……这些行为共同构筑起一种“泳道伦理”——它不依赖口号,而体现在每一次交接棒的信任、每一次让道的谦逊、每一次面对质疑的专业回应中。这种伦理,正是中国体育向世界传递的另一种团结叙事。

这种“泳道伦理”并非凭空而来,其深层结构可追溯至中国传统“礼”的实践智慧——“礼者,履也”,强调规则必须通过身体践行才能内化。泳池中的道次秩序、出发静默、交接信任,正是现代体育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创造性转化。它不靠强制,而靠反复的身体操练达成共识;不靠说教,而靠共处一池的相互体认形成默契。这种“身体化的道德”,或许正是中国体育贡献于全球奥林匹克伦理的独特资源。

5 走向自主:构建中国游泳文化的理论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游泳研究高度集中于训练科学、运动生理与技术分析等实证领域,而对其历史脉络、身体文化、教育哲学等人文维度关注严重不足。这种“重术轻道”的学术格局,本质上是体育学学科内部“文理割裂”的缩影。

值得关注的是,代际间对游泳价值的认知存在显著张力。在粤西调研中发现:祖辈多视下河游泳为“野

性危险”,父辈则期待“学会保命”,而青少年更倾向将其视为“社交技能”或“身材管理方式”。这种代际认知断层,既是挑战,也是构建本土理论的切入点。未来可开展代际口述史研究,梳理“水”在家庭记忆中的意义变迁,从而揭示游泳如何从“生存技艺”演变为“生活美学”,再升华为“育人载体”。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微观叙事。

未来研究亟需方法论自觉。例如,我们可采用教育民族志方法,长期跟踪记录乡村儿童首次下水时的身体颤抖、家长访谈中的安全焦虑、教师在资源匮乏下的教学创造性;也可运用视觉分析,解读游泳宣传片中“身体形象”的变迁(从“健美”到“健康”再到“坚韧”)。这些微观研究,才能支撑起“水育人格”“自救即自立”等本土概念的理论厚度。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部分师范院校开始探索游泳教育的“体教融合”新路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提炼“水德育人”理念,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包容品格、《论语》“智者乐水”的理性精神,与现代体育强调的自律、公平、坚韧等价值相融合,构建一种基于中国身体经验的体育教育哲学。

面向未来,亟需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游泳文化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应包含四大支柱:第一,史料深耕。系统整理晚清教会档案、民国游泳教材、当代政策文件,建立中国游泳史料数据库;第二,概念原创。提炼如“自救即自立”“水育人格”“泳道伦理”等本土范畴;第三,方法融合。引入民族志、行动研究、视觉分析等工具,捕捉水中身体的微观政治;第四,学科交叉。推动体育学与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的实质性对话,打破“体育人文社会学”二级学科的封闭性。

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体育话语中发出不可替代的中国声音,构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凝练好我国各个运动项目的文化。

回望千年,端午龙舟鼓点如心跳,桨影似臂划,那是中华民族对“合力致远”的古老信仰。今天,当我们把孩子送入泳池,不该只想着他能否破纪录,更要问:他是否学会了在逆流中坚持,在浮沉中平衡,在孤独中前行?

站在“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三大战略交汇的新起点,游泳教育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底线,更要涵养其谦下、坚韧、自律的品格。游泳,终究不是为了更快抵达终点,而是为了更完整地成为一个人。这条路还很长,但只要我愿意从“成绩是多少”转向“成长是什么”,碧水之中,必有回响!

武术的历史、文化与学术

郭玉成

(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由古至今,武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下,不断汲取中国哲学、伦理、养生、军事、艺术等文化要素,构建起融身体技术、哲学思想、道德理念、艺术表达、人文精神于一体的文化体系。在发展演变中,武术不仅承继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还在“术与道”“体与用”“身与心”的融合中,将内隐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悟、可传的身体实践与生存智慧。如果以学术思想挖掘其历史底蕴,则可激活其创新创造之文化力。

1 武术的历史

1) 武术的历史演进。

武术的历史轨迹镌刻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演进长河之中。溯其源,可明其何以博大;探其奥,可知其何以精深。从原始社会狩猎求生的格斗萌芽,到夏商周时期“武舞”“射御”的早期形态,武术自诞生便兼具保障生存的技术底色和人文教化的温润质感,是华夏先民顺应自然、经世致用的集体智慧结晶。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争鸣,奠定了武术“术道并重”的思想根基。大一统背景下,秦收天下之兵,实行民间禁武政策。到汉代,又呈现出兵民合一、寓兵于农的复苏景象。隋唐时期,武举制的设立开创以武入仕的先河。宋代瓦舍勾栏的职业化演武与元代远征亚欧的骑射武艺,推动武术进一步发展。步入明清,武术迎来繁荣发展,拳种流派百花齐放,《纪效新书》《武备志》等典籍相继问世,武术的技术与理论体系逐渐完备。中华民国时期,正值抵御外侮、强国强种之际,武术改称为“国术”,并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开始向体育和教育方向发展。历代习武者的口传心授加之文字记录,使武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武术的演进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同频共振,是一部以史为轴、以文为脉、以武为笔展开书写的发展史。

2) 武术的现代转型。

从传统走向现代,武术的转型之路循着历史发展不断演进,在文脉赓续和时代革新中完成蜕变,成为传统文化活化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在“增强人民体质”的时代号召下,武术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1979年《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抢救性保护了百余项传统拳种、数千册古拳谱与海量口述历史,

让武术重焕生机。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电影《少林寺》的热映将武术传遍大江南北,街头巷尾的武术班培训、学习应运而生。1990年武术成为北京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进入21世纪,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武术以盛大表演惊艳亮相,向世界递出一张厚重的中国文化名片。

新时代以来,武术转型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聚焦体育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形成多元发展格局。在体育领域,武术被列入第4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在教育领域,《中国武术教育倡议》提出武术具有“立德、增智、强体、育美、尚劳”的独特价值,可以更好支撑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在文化领域,太极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健康领域,太极拳康养为全民健康提供独具特色的武术方案。武术的现代转型以历史为根、以时代为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武术的交流互鉴。

武术自诞生起便秉持开放包容的品格,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桥梁,在跨文化交流中书写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篇章。历史上,春秋战国“胡服骑射”开启跨族群交融的先河。汉代丝绸之路成为武术西传的重要通道,武术技艺与器械远播中亚、西亚。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兴盛,部分传统拳种随侨民传到东南亚,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纽带。

时至今日,武术在这条跨越千年的交流之路中价值愈发鲜明、辐射日益广泛,成为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鲜活载体。现在,国际武术联合会会员国(地区)总数已达160个,覆盖五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使武术真正成为跨越国界、联结民心的文化使者。202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每年3月21日设立为“国际太极拳日”,武术的文化价值与健康价值越来越被世界接纳。从历史上的技艺传播到如今的文明对话,武术国际传播始终秉承着和而不同的原则,为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

2 武术的文化

1) 武术的价值理念。

武术的价值理念源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在长期身体实践中得以锤炼与升华,既指导着武术技艺的习练,也形塑习武者的行为准则与精神世界。其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武术中无论是形意拳模仿动物形态,还是太极拳习练注重顺四时而动,均是以身体实践诠释天人相参的整体智

慧。第二,“身心合一”的修炼观。武术强调“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追求形神兼备、内外兼修,通过“以形喻意、以意导形”实现身心协调统一。第三,“德艺双修”的实践观。武术讲求“武以德立”“未曾学艺先学礼”的处世秉持,始终强调德与技相辅相成,追求文武双全的理想人格。第四,“阴阳和合”的方法论。太极拳舍己从人的技击智慧,在矛盾对立中把握统一,体现刚柔相济、虚实相应、动静相生等东方辩证思维的精妙。第五,“和合共生”的世界观。武术之“武”,终极追求是通过自我超越,达成与自我、他人、社会的和谐共存,彰显着中华文化崇尚和平、包容共生的天下情怀。

2) 武术的社会功能。

武术的社会功能并不局限于练功场的方寸之间,而是化作浸润民族生活肌理的文化实践,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教化育人功能。武术注重筋骨锤炼与心性涵养,将体魄锻造、意志磨砺、德行熏陶和审美浸润融于一招一式,让自省自觉的品格在武术实践中慢慢生长。第二,认同凝聚功能。在乡土间,武术是维系情感与记忆的重要纽带;在家国中,曾为“强国强种”提供支撑,唤醒民族自觉与认同,承载深厚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第三,身心调适功能。武术遵循身心共生之理,以“调身、调息、调心”的要义,在动静转换、形气相依中构筑身心安顿之道,寻得回归内在平衡的文化理路。第四,文化传承功能。武术以口传心授的形式、身体实践的承继、创新创造的发展,容载历史、哲学、中医、伦理等多重文化基因,成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第五,文明对话功能。武术是跨越语言与国界的文化使者,从国内武校到海外武馆,从武术节目到国际影视,不断将中国文化传向世界,搭建起民心相通的跨国之桥。

3) 武术的文化符号。

武术的文化蕴含通过可感、可触的符号得以具象表达,形成寓意深远的象征系统,使抽象哲理融入日常实践。第一,武术仪式符号。武术中的拜师礼,通过规定的仪式确立尊师重道的伦理契约,以表现习武者对师门的敬诚,遵守着“传艺先传德”的准则,彰显出武术薪火相传的文化自觉。第二,武术规则符号。例如,武中的“点到为止”,将“仁”的精神深植竞技对抗之中,尽显“君子无所争”的风度。而训练中的“内外三合”,则将“身心合一”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可依的习练法则。第三,武术意象符号。太极拳动作中无处不在的“圆”形轨迹,蕴藏循环往复、包容转化的宇宙哲思,也暗含不丢不顶、顺势而为的处世智慧。武术套路中的龙、虎、鹤、猴等象形拳法则更

显妙趣,通过捕捉自然生灵的神韵态势,能让习武者体会“道法自然”的传统智慧。

3 武术的学术研究

1) 武术的学术研究回顾。

武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应地学术研究,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断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使研究者开始重视和审视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并尝试从传统哲学等视角进行阐释,形成超越武术作为技艺的文化认知。第二阶段是90年代末至北京奥运会时期,随着上海体育学院获批全国首个“武术理论与方法”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武术入奥呼声的高涨,研究者结合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视域,围绕武术的概念内涵、结构要素等议题展开思考,推动武术研究从运动项目认识上升为理论方法构建,学术体系初步建立。第三阶段是北京奥运会后至今,武术研究在回应强国建设的议题中,着力文化、教育、健康研究,提炼出标识话语和自主理论,实现从借助外来理论阐释向自主知识建构的转变,主动向世界传播武术声音。

2) 武术的学术研究亮点。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武术研究紧跟时代步伐,理论建构向广向深、典型成果相继涌现、方法范式日益多元,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武术力量。在文化自信时代话语的引领下,武术研究延展出更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形成武术拳种理论、演练理论、养生理论等基本理论,武术哲学、武术美学、武术传播学等分支理论,以及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应用理论,构建起层次分明的武术理论体系。同时,武术领域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武术通史研究与编纂》立项、大型武术丛书《武藏》编纂工程启动,体现了当代武术研究不断强化的学术自觉意识与知识建构能力。在此过程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武术研究不断开拓方法范式,例如,上海体育大学与百度联合研制出全国首个“非遗武术大模型”,创新构建“人工智能+武术”的研究范式,为武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开辟新领域。

3) 武术的学术研究展望。

武术研究经过长期发展与创新,基本理论渐达共识,研究方向渐趋聚焦,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学术体系。面向未来,武术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提升研究决策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武术研究要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将自身发展融入时代所需。例如可锚定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聚焦武术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为政策

制定提供依据。二是推动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建构中华武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立足武术的理论概念、知识范畴、方法范式等问题,加强与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脑科学等多元学科理论、知识、方法的交叉融合,加快建构中华武术学自主知识体系。三是探索发展规律,促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规律的认识是对未来的指导,深入研究武术发展的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共性规律,探索顺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求的创新性发展方式,推动武术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活力。

武术作为独特的文化创造与身体智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加强武术历史根脉、文化精髓、价值内核的纵深化、体系化研究,在对武术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使其跨越历史成为能够回应时代关切的文化资源。深刻阐发武术讲仁爱、崇正义、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要全面激活武术的创新创造活力,使之与教育、健康、产业、科技及国际传播深度融合。同时,应加快建构具有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武术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培育出具有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武术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建设。

大体操类运动项目文化观的融合创新

樊莲香¹, 王琪²

(1.华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2.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50)

中国艺术体操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历史性夺金,我国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在奥运赛场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比赛中运动员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超技术技巧完美融合,其兼具汉唐风华与当代审美的精彩演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中创新性表达的生动诠释。现如今,大体操类项目(包括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早已超越单纯的竞技范畴,而是作为承载文化基因、传递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作为融合体育与艺术的独特存在,大体操类项目既延续着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文化脉络,又凝聚着崇尚审美、追求突破的精神内核,同时随着学术自觉的不断深化,更是让该项目的未来发展有了可参考的理论根基。鉴于此,研究遵循“传承—内核—自觉”的逻辑脉络,探讨大体操类项目在融

合创新中绽放的文化魅力与时代价值。

1 历史溯源：从西学东渐到文化自觉

大体操类运动项目作为现代竞技体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既是体育全球化的缩影，也是中国文化自觉与本土化实践的生动体现。依据田麦久提出的“项群训练理论”，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同属“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它们共享着对技术难度、动作美感、身体表现力及成套艺术编排的极致追求。诚然，这一共性也为从宏观上把握其文化演进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历史脉络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引入与奠基期，即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体操运动随“西学东渐”浪潮传入国内，最初是以兵操（军事体操）、体操等形式在清朝学堂中逐步推广，旨在“强国强种”。因而，此时的大体操类运动项目文化更多体现在对西方体育模式的模仿与学习，故属于起步阶段。

第二，体系化与突破期，即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末。在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支持下，竞技体操率先实现突破且成为“为国争光”的重要载体，而艺术体操等运动项目相继引入并建立专业化队伍。此阶段，我国在技术训练和竞赛规则上努力与国际接轨，而对文化层面的思考多集中于“如何练”与“如何赛”，因此对运动项目自身文化内涵的挖掘尚处于自发阶段。

第三，文化自觉与创新期，即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体育界开始重新审视运动项目具有的文化属性。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因其具备与音乐、舞蹈、服饰、仪式等文化要素的天然亲和力，使其成为体育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此阶段，不再满足于对运动项目技术的追赶与突破，而是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植入运动项目的血脉之中，从而实现从“技的模仿”到“艺的创造”与“文化的表达”的升华。中国艺术体操、健美操等竞技运动项目在国际赛场上频频以“中国风”编排令人惊艳，便是这一阶段文化自觉的鲜明标志。

2 文化精神：身心合一、艺体相融的价值内核

作为表现难美性项群的典型代表，大体操类运动项目不仅超越了单纯体能竞技，还升华作为一种集体育、艺术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展示。因此，其精神内核可概括为“身心合一、艺体相融”。

首先，在价值理念层面，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倡导追求卓越、内外兼修的文化哲学，要求运动员具备超群的身体素质（包括力量、柔韧、协调），更需拥有高

度的艺术感悟力和稳定的心理素质，而这与中华文化中“形神兼备”“技进于道”的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训练与竞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严苛的修身实践，锤炼着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审美情趣和对完美不懈追求的拼搏精神。

其次，在社会功能层面，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具有显著教育意义、审美价值和国际交往功能。在学校体育中，它是塑造青少年良好体态、培养节奏感与表现力的有效手段；在社会影响层面，作为观赏性极强的竞技体育赛事为公众提供高水平的艺术享受，提升社会的审美素养；在国际舞台上，它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传播国家文化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最后，在文化符号层面，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形成丰富象征系统。具体而言，规则是其理性的骨架，确保了竞争的公平与技术的可比性；成套动作编排则是其感性的血肉，是文化叙事与情感表达的载体；而服饰、器械与音乐等则构成了最直观的文化符号。中国艺术体操队、健美操队的运动员在近年来国内外比赛中巧妙运用中国古典音乐、传统服饰元素、以及武术、戏曲的身段与韵律，将“龙飞凤舞”“丝绸之路”“青花瓷”等文化意象转化为独特的视觉与听觉语言，极大丰富了此类运动项目的文化表现力与感召力。

3 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引领

大体操类运动项目的从业者通过对文化属性的深入研究，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历程，进而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知识框架，为实现其学术自觉贡献了中国力量。

在理论建构方面，依托“项群训练理论”对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等大体操类运动项目的训练规律、制胜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为其科学化训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学界开始从文化学、美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切入，以深入探讨“中国元素”在难美性项群中的表达机制与效果评估。例如，对艺术编排中“意境”营造的研究，对传统美学“虚实相生”“气韵生动”原则在动作连接中应用分析等，均体现出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自觉。

在实践应用方面，中国大体操类运动项目的探索为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方案”。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项目夺冠，堪称文化赋能体育的典范之作。其中，成套动作《凤鸣凌霄》绝非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进行了深度的文化解码与创新表达；彩带的飞舞轨迹摹拟古筝音乐的韵律，器械的抛接与滚动仿佛明灯流转，而贯穿始终的京剧念

白与汉唐舞蹈的气韵,共同构筑充满东方哲思与浪漫色彩的审美空间。事实证明这套动作的成功,证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体育的竞技要求和艺术规范进行创造性融合,能够生成强大、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已经实现从技术追随到文化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4 未来展望:文化赋能、艺技融合与体系创新

展望未来,中国大体操类运动项目的发展路径已是愈发清晰,尤其是文化自觉将驱动其迈向更高维度的发展阶段。

首先,文化赋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诚然,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在未来的竞争不仅是难度上的竞争,更是体现在文化叙事能力与美学表达水平等方面的竞争。因此,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非遗技艺、传统美学思想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解码。从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艺术形式(如书法、壁画、古典舞)中汲取营养,让“中国风”从赛场上的视觉符号,深化为渗透在动作逻辑、节奏处理和情感表达深处的文化基因,以便形成独特“中国流派”。

其次,竞技水平与艺术表达实现更高维度融合。虽然对于大体操类运动项目而言,技术难度是重要基础,但绝非终点。未来其发展的关键仍在于“艺技融合”,即让每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都承载文化意蕴和情感张力,而这也这就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和编导团队具备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跨学科知识结构,以便在动作设计、音乐选择、空间运用上实现更富创意的多维度整合。

最后,构建科学、开放、可持续的后备人才培养与赛事体系。实践表明,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人才作为支撑。因而,应进一步完善从青少年启蒙到专业精英培养的梯队建设,将美育和文化教育融入运动员训练与培养的全过程。与此同时,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体操类运动赛事IP,使其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通过科学的备战体系和完善的保障机制,确保我国大体操类运动项目能够持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大体操类运动项目作为“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的集大成者,其目前的发展已步入以文化自信为底蕴、以学术自觉为指引、以创新表达为路径的新时代。我们应以文化使命感,推动大体操类运动项目实现从“体育技艺”到“文化载体”深刻转型。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让中国的大体操运动不仅能通过摘得金牌闪耀全球,更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东方美学,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叙事中灵动而璀璨的华

丽篇章,最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竞技体育所独有的艺术魅力和力量表现。

以体载道 以美育人

——体操的历史传承·精神内核·学术自觉

范峰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29)

体操的历史长河,流淌着人类对身体潜能的探索与对生命之美的追求。追溯源流,体操的雏形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体操术”,那时的人们通过跳跃、奔跑、投掷等基本动作训练身体,兼具强身健体与培养意志的双重目的,这也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重要源头。而在中国,古代的“导引术”“五禽戏”等养生功法,以肢体舒展、呼吸调和为核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与现代体操的健身理念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体操逐渐从传统体育中分化出来,成为标准化、系统化的竞技项目。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体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到20世纪初体操规则的逐步完善,再到中国体操自1953年成立国家集训队以来的砥砺前行,体操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运动技术不断革新的进化史,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体育精神代代相传的文化史。体操每一个动作的迭代,每一套编排的创新,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承载着人们对健康、力量与美的永恒向往。

如果说历史是体操文化的根基,那么融入血脉的精神内核便是其永葆生机的灵魂。体操运动所彰显的文化精神,其一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个空翻动作的角度校准,一次平衡木上的姿态调整,一场吊环静态的平衡展示,往往需要运动员千百次的重复训练,这种对技术极致追求的态度,正是工匠精神在体育领域的生动诠释。其二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体操项目对体能、技巧与心理的要求极高,运动员在训练中难免遭遇伤病困扰与挫折打击,而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荣耀时刻,背后是无数次摔倒后的重新站起,是面对困境时的永不言弃,这种坚韧品格不仅成就了运动员的个人梦想,更激励着国人在各行各业中奋勇拼搏。其三是“和谐共生的审美精神”。体操将力量与柔韧、速度与平稳、技巧与艺术完美融合,无论是自由操中与音乐的无缝衔接,还是艺术体操里器械与肢体的默契配合,都传递着“中和之美”的文化意蕴,展现着人类对身体与自然、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追

求。在新的时代,这些精神财富,已然超越了竞技体育的胜负界限,成为承载人类追求卓越、崇尚和谐的文化载体,也成为滋养心灵、培育品格的重要养分,彰显着体育文化独特的育人价值。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体操知识体系,既是传承发展体操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战略举措。长期以来,国际体操领域的规则制定、技术标准与理论体系多由西方主导,中国体操虽在竞技成绩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输出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构建中国自主体操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文化土壤,挖掘传统体育中的智慧精华,将“导引术”的养生理念、“武术”的发力技巧等融入现代体操训练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训练理论与实践体系;需要加强体操文化的理论研究,梳理体操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总结优秀运动员的成长规律与教练团队的执教经验,形成系统化的学术成果;需要推动体操规则与编排的文化创新,在遵循国际通用标准的基础上,将中国元素、民族文化融入动作设计与音乐选择,让体操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将中国体操的知识成果与实践经验推向世界,推动全球体操文化的多元发展,让世界看到中国体操不仅有竞技实力,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知识体系。

展望未来,体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面临着新的

机遇,也肩负着新的使命。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实施,体操运动的群众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从校园里的广播体操、健身操到社区中的健身器械体操、广场舞、老年柔力球运动,体操正以更加多元的形式走进大众生活,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健康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需要进一步推动体操运动的普及推广,完善校园体操教育体系,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操项目,让更多人感受体操运动的魅力;要加强体操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体操文化 IP,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线下体验活动等形式,讲好中国体操故事,传播体操文化精神;要持续推动体操项目的创新发展,结合科技进步优化训练手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训练科学性与精准性,同时在编排设计上紧跟时代潮流,融入更多现代元素与文化内涵,让体操运动始终保持新鲜感与吸引力。

体操,这一跨越千年的运动项目,在新时代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它既是竞技赛场上为国争光的硬核力量,也是校园里品格教育的育人载体,更是大众生活中追求健康的时尚选择。从历史溯源中汲取智慧,在精神传承中凝聚力量,于知识构建中明确方向,在未来发展中勇担使命,中国体操文化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为培育时代新人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